

WHY DIDN'T MR. CHAPL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

MIND THE BABY?

[英]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著

when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Board from 1895 to 1900.

罗素回忆录

40,000 Infant Lives Every Year!

What did we do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the Reduction of
Infant Mortality?

来自记忆里的肖像

If Women had Parliamentary Votes

they would try to alter the

Bad Land Laws

which make these bad smoking conditions and result in such wicked
waste of life.

But Mr. Chaplin wants to make the
Baby's Food and Clothing Dearer,

and this will only

MAKE MATTERS WORSE.

THE SOLUTION

VOTE for RUSSELL

or

And Give Women Votes to Protect the Children.

希望出版社

P O R T R A I T S

F R O M

M E M O R Y

A N D

O T H E R

E S S A Y S

罗素回忆录

来自记忆里的肖像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吴凯琳 译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素回忆录/[英] 罗素 (Russell, B.) 著; 吴凯琳译.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6. 5

书名原文: 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

ISBN 7-5379-3660-9

I. 罗... II. ①罗... ②吴... III. 罗素, B. (1872~1970) —回忆录 IV. 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18409号

Copyright © THE 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 LTD.

Text Copyright © BERTRAND RUSSELL

Original title © 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

Cooperatingly published by SOUTH PUBLISHING HOUSE & HOPE PUBLISHING HOUSE

Art Work Copyright © 2006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Guangzhou

All rights reserved

图片支持:  www.fotoc.com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4-93号

所有权利保留

罗素回忆录

——来自记忆里的肖像

作者/[英] 伯特兰·罗素

译者/吴凯琳

责任编辑/薛蔚原

特约编辑/徐维光

复审/陈炜

终审/琚林勇

装帧设计/唐薇

出版发行/希望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制作/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规格/760×1020mm 1/16 12印张

版次/200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5379-3660-9/G·2985

定价/28.00元

咨询电话: 020-33199099



目录

contents

4	自传概述
14	六篇自述
14	Ⅰ. 我为何喜欢哲学
18	Ⅱ. 哲学的交流
25	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者经验
30	Ⅳ. 从逻辑到政治
34	Ⅴ. 信仰：摒弃与保留
37	Ⅵ. 希望：实现与破灭
41	如何老化？
45	80岁生日的反思
51	记忆里的肖像
51	Ⅰ. 19世纪90年代的剑桥大师
56	Ⅱ. 我在剑桥的同侪
62	Ⅲ. 萧伯纳
66	Ⅳ. 威尔斯
70	Ⅴ. 康拉德
74	Ⅵ. 乔治·桑塔亚那
78	Ⅶ. 怀海德
82	Ⅷ. 韦布夫妇
86	Ⅸ. 劳伦斯
89	约翰·罗素
94	约翰·米尔
94	Ⅰ. 人生
98	Ⅱ. 学术
101	Ⅲ. 理想
107	Ⅳ. 自由
114	精神与物质
126	膜拜“惯用法”
131	知识与智慧
135	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140	追求清晰的思维
145	历史也是一门艺术
161	我如何写作
165	通往快乐的道路
171	奥威尔的《1984》症候群
180	人类面临的险境
182	严峻而逃避不了的问题
184	走向和平
190	罗素眼中的中国人

自传概述

许多年轻人难以想象1914年以前的世界，也就更难理解一个像我这般年纪的人的儿时记忆与现今时代之间何以有如此大的差异。我一直设法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帝国瓦解、共产主义兴起、原子弹、亚洲自我觉醒以及贵族没落的世界，尽管没有收到什么了不起的成效。在这个充满不安全感的陌生世界里，没有人知道明天是否还活着，旧有的古国如同清晨薄雾般消失于无形，对于那些年轻时习惯于老式稳定世界的人来说，要相信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绝非短暂的梦魇，实在是非常艰难的。我孩童时代所经历的制度与生活方式，如今早已不知去向。

我在一个非常传统的氛围中成长，父母在我有记忆之前即已过世，祖父母将我养育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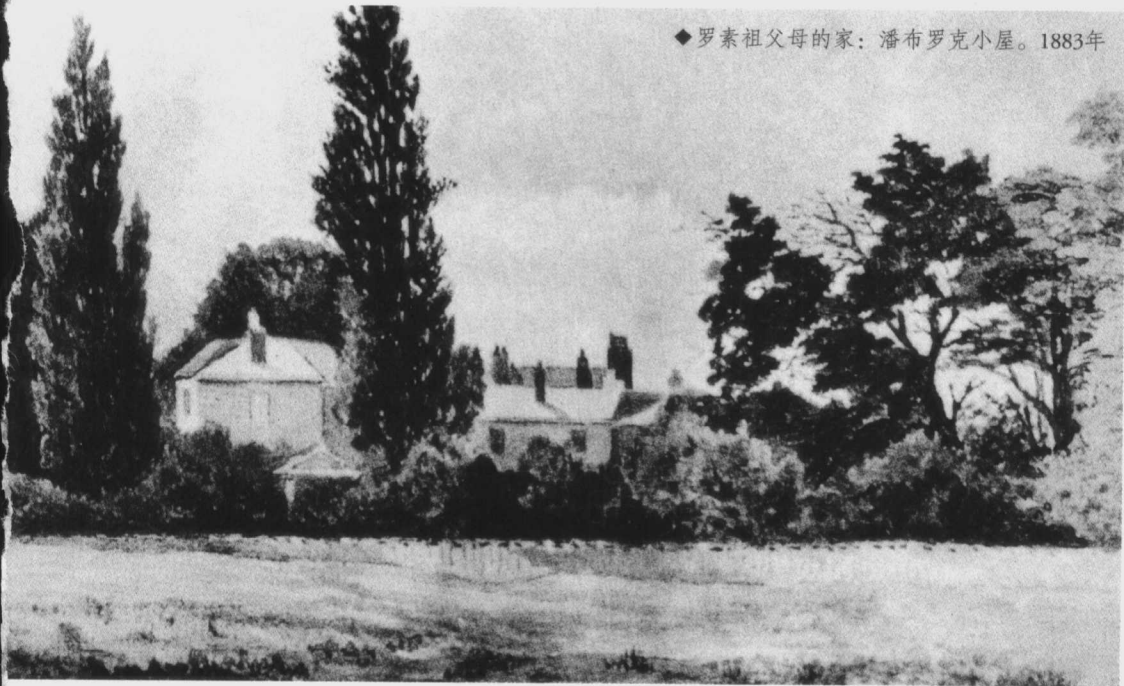
祖父生于法国大革命的早期，在拿破仑执政期间担任英国国会议员。身为追随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 ~ 1806）的辉格党党员，他认为英国对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敌意太深，因此他曾亲自到厄尔巴岛（Elba）拜访过被放逐的拿破仑。1832年，他提出“改革法案”^[1]，从此使英国开始走向民主之路；而在墨西哥战争^[2]与1848年革命^[3]期间，他正好担任首相的职位（1846 ~ 1852）。祖父与整个罗素家族一样，承袭了贵族式自由主义的独特风格，这正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特征，而在当时祖父的祖先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我被教导并接受一种共和政治观点，亦即只要君主知道自己是受雇于人民，要是表现不能令人满意时便会被解雇，那么我们就可以容忍君主的存在。对人一视同仁的祖父常在维多利亚女王面前阐述这番理念，女王并非全然同意，但是仍赐予他一栋位于瑞奇蒙公园的房子，而我的少年时光即在此度过。

我吸收了一些政治上的基本信念与期望，尽管被迫拒绝后者，但总体而言仍能保留前者。过去认为整个世界应该是有秩序地进步，没有革命，战争逐步停止，并将议会政治推广至那些尚未享受议会政治好处的不幸地区。我祖母常以她与一位俄国大使之间的对话作为笑话，她说道：“也许未来有一天俄国会成立议会。”那位大使回答道：“求上帝别让它发生，我亲爱的勋爵夫人。”今日的俄国大使也许会有相同的答案，只是会因为他的无神论而拿掉“上帝”这两个字。当时的期望在今日看

来似乎是有些荒谬了。过去认为民主之存在是以人民总是会愿意遵循有智慧与有经验的贵族的忠告为前提的。过去也预见了帝国主义的消失，但是长期以来受帝国支配的亚洲与非洲各民族在英国自愿结束统治后，应该学到以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国会议员人数各半所组成的两院制的优点，在热带地区复制如狄斯累利^[4]与格拉史东^[5]两雄对决的议会战争——正是在这两位大人物政治生涯达到高峰之际，我吸收了我主要的政治偏见。当时从未有人想过英国的权势会受到威胁，英国主导了政治的潮流，这就是事实。那时我确实是被教导视俾斯麦为无赖恶棍；但是当时一般人也认为歌德与席勒所遗留的文明素养让德国不会在这位未开化的农夫领导下永远走向错误的道路。然而暴力出现在不久之前的日子里也是事实。法国人为法国大革命的分行径感到懊悔的同时，也强调反动分子过于夸大事实，而且要不是其他欧洲人对于法国境内进步的民主思潮产生愚蠢的敌意，这类过分的事情或许不致发生；也许我们得承认，克伦威尔^[6]强行砍下国王头颅的行为太过分，但是就整体而言，任何反对皇室的行为在当时都是受到喝彩的；除非这是由教会人士发起，就如同誓死保卫教权而不惜与国王发生冲突的贝克特主教（Becket），这时人们就会站在国王这一边。

我少年时家庭生活的氛围是一种清教徒式的虔诚与清苦：每天早上8点家庭成员都必须祷告；虽然有8名仆人，但是食物却极其简单，即使是普通的美食，他们都觉得对小孩来说太过奢侈。例如，如果同时有苹果派与米布丁，我只能吃米布丁；整年都必须洗冷水澡；每天早上7点半到8点为练琴时间，就算火炉没点燃仍要

◆ 罗素祖父母的家：潘布罗克小屋。1883年



◆罗素9岁时



◆“我的父亲是约翰·罗素爵士的长子，我的母亲凯特·斯坦利是斯坦利爵士的第四个女儿。他们都生于1842年。在我2岁那年，我的母亲去世了，20个月以后，父亲也随她而逝。”——罗素



照常练习；祖母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才会让自己坐扶手椅。酒精和烟草是不受欢迎的，只有在款待客人时才不得不依循传统以酒相迎。只有美德才受到珍视，可以为此而牺牲思维、理解能力，健康，快乐以及世俗的一切美好事物。

我最早是以思维和理解能力来反抗这种氛围的。当时的我是一位孤独、害羞却又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完全没有体验到男孩时期的社交快乐，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遗憾。我非常喜欢数学，在当时，数学是受到质疑的，因为它无关乎道德。关于神学的观点我同样和家人的意见不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哲学的兴趣也愈来愈浓，而这正是家人最反对的。每次讨论到相关的话题时，他们就重复述说着一成不变的话语：“什么是精神？一点也不重要。什么是物质？别费心思了。”经过五六十次的重复后，这样的谈论便再也引不起我的乐趣了。

18岁时，我进入剑桥大学读书。置身于这里的众人之中，我突然感到非常困惑——如果我说出任何真心话，既不会有人瞪着眼把我当作疯子，也不会有人视我如罪犯而加以痛斥——可是这群人所说的语言对于我来说，却又是这么熟悉的母语！过去，我被迫生活在一种病态的氛围里，不得不听任其中一种有害身心健康的道德观被助长推动到足以让智慧瘫痪的程度；而如今，令我欣喜若狂的是，我终于身处一个重视理智及思考的世界里了。有人说受过非常规教育的人是很难适应世界的，但我没有这样的问题，在这里，我如鱼得水。第一学期，我就交到了一些终身的好友，使得我从此再也不需忍受青少年时期的孤独了。

在剑桥的前3年，我都在学习数学，第4年则是哲学。当时我正认为自己过去被教导过的哲学思想是错误的病态的，然而此时学到的哲学却带给我愉悦，并给我提出一些我希望有能力去解决的迷人的新问题。我对数学的基础理论最感兴趣，我想要获得的是一些确凿无疑的知识，而我认为最有希望的是在数学里找到这些可靠的知识。但是，教授所传授的某些关于数学命题的验证对我来说是明显有错误的，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发展出更好的证明方式。后续的学习验证了我的预期部分是正确的，可我却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找出所有可能的合理解释，有些甚至与我少年时的期望有所不同。

结束了在剑桥的学习生涯后，我必须决定是要投身于哲学还是政治领域。自16世纪开始，投身政治领域就成了家族成员的惯例，而其他则一律被视为是对“祖先的背叛”。所有情况都显示如果我选择政治，未来将会一帆风顺。担任爱尔兰国务大臣的莫雷（John Morley）给我安排了一个职位。杜菲林勋爵（Lord Dufferin）是英国驻法国大使，也提供给我一个在大使馆里工作的职位。家族的成员想尽一切办法逼我就范。曾有一段时间我有些犹豫，但最后仍抵不过哲学的诱惑。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冲突，使我的内心着实感到痛苦不已；自此之后经历数不清的冲突，或许旁人会以为我很乐意享受这样的经验，其实我更喜欢与他人和平相处。但是一次又一次深刻的信念迫使我无法与他人取得共识，哪怕那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然而就在决定选择哲学作为终身事业后，在一段很长时间里却事事平顺。

我主要生活在一种学术氛围之中，追求哲学不被视为是愚蠢的行为。到1914年为止，一切都发展得极为顺畅。然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认为就介入的两方集团中的每一个强权而言，它都是一个愚行和一项罪恶。我希望英国能保持中立，当希望落空时，我则继而提出抗议。这使我感到孤立，大多数以前的朋友与我疏离，更让我难过的是自己与整个国家坚持的方向背离。我不得不依靠来自自己内心的力量。然而某种（如果我有宗教信仰的话）我会将其称之为“上帝的呼声”的东西，强迫我坚持到底。不论是在当时或是日后，我从不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错误的。我所谴责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非所有的战争。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必要的，这并非是我对战争的观点有所改变，而是环境有所不同。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无可避免，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的后果给我们带来了俄国共产主义，还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及德国纳粹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一个混乱动荡的世界，德国、法国与曾属于奥匈帝国的地区文明发展都不进反退，亚洲与非洲未来的情势则一团混乱，大规模的疯狂杀戮则让人随时处在惊恐的状态中。这所有的不幸如同希腊悲剧般不可避免，都是源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反过来思考，如果英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战争时间必将会缩短；德国将会获得最终的胜利；美国不会被卷入战争；英国仍能维持原有的强势地位与繁荣；德国不会产生纳粹主义；俄国也许仍会发生革命，但十之八九不会有共产主义革命，因为一场短暂的战争不可能使俄国在1917年落魄至全面陷入混乱的局面。虽然我方的战争宣传将德皇统治下的德国描绘得非常凶暴残酷，但事实上只是夸大其辞而且有点可笑。

我曾在德国呆过，可以感受到当地强大的进步力量，带来终将成功的远景。德皇所统治的德国比起英国与北欧地区以外的国家要自由得多。当时我们被告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自由与民主而战的，是为推翻军国主义而战的；但战争的结果却是自由就此销声匿迹，军国主义反而更加稳固。至于民主，它的未来仍是个未知数。如果当初英国保持中立，让德国立即获得胜利，我无法想象世界还会如现在这般恶劣。

基于以上理由，我从不认为自己当时的观点有任何错误，也不后悔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企图说服大众，德国并非如官方宣传的那般邪恶。之后许多陆续发生的灾祸也是严苛的《凡尔赛条约》所导致的，而且要不是因为心理上恐惧德国，这种严厉的惩罚就不可能出现。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完全不同，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愚蠢所造成。如果人类还要活下去的话，就必须与纳粹德国战斗。如果俄国要争取世界领导权，那么与他们开战恐怕也一样有其必要。但是这一连串可怕的事件都是起因于1914年的错误，如果当时能避免，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未结束我的孤立，相反的，却是一个更彻底的孤立的前奏（除了亲密的好友以外），原因是我没有向新的俄国革命政府喝彩捧场。当俄

◆ 剑桥一景



国革命刚爆发时，我和所有的民众一样热烈欢迎，其中包括驻彼得格勒的英国使馆人员。因为距离的关系，我无法确知1918年与1919年所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应如何看待布尔什维克党人。

1920年时，我去了一趟俄国，与列宁和其他知名政要长谈，尽可能地观察当地的局势。当时的激进分子认为不管俄国革命将如何发展，都应支持它，因为反动分子极力反对革命，因而若是批判革命就正中他们的下怀。我感受到这种论据的力量，因此有一段时间对自己该如何做便有所迟疑。正因为如此，自1914年以后所结交的朋友也就此分道扬镳。多数人仍因为我反对战争而痛恨我，少数不因为我反战而痛恨我的人则因为我不赞扬布尔什维克党人而指责我。我抱着迷惑的态度怀疑：到底是我的朋友疯了还是我自己疯了？然而那份忠于自我判断而不随波逐流的习性在战争期间已变得越来越坚强。就历史的发展而言，革命的热忱必定会转化为帝国主义似乎是再明显不过的，我们可由法国大革命得到印证。最后当我决定说出自己对布尔什维克的想法之后，以前在政治上的朋友，包括许多曾经同意我意见的人，把我痛斥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不过反动分子并未注意到我的言论，仍然在报纸上批评我是“懦弱的共产猪”。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两面不是人。

就在这个时候我有了机会走访中国，度过了一年十分快乐的时光，让我得以远离欧洲的纷乱，否则情况会更为痛苦不堪。从此以后，虽然偶尔会有冲突，但是相对于因一战与布尔什维克所引发的冲突，这些更多只是表面的冲突，而且痛苦较少。

1921年自中国回来后，有好几年我都在研究教育中的亲子关系与相关的问题。

◆1920 ~ 1921年，罗素访问中国时，在北大



虽然我不甚喜欢传统的教育，但是就纯教育问题而言，我以为大多数学校所宣称的“渐进式教育”事实上是不完善的。当时我认为——至今仍如此认为——身处在科技如此复杂的现代文明中，一个人除非在少年时即接受相当分量的完整教育，否则很难在社会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没有一所让我感到满意的学校，因此希望自己能建立一所学校。但是学校是需要管理的一种企业，而我恰恰缺乏担任行政主管所需的技巧，因此这次办学失败了。

幸运的是，就在同一时间我找到了另一所新近表现相当优异的学校。我写了两本关于教育的著作，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思考教育问题，但是就如同一般人所预料的，我讲话要比做事来得好。我不认为在儿童时期应给予完全的自由。儿童需要做些规定的例行事务，不过也应该有某些日子可以不用去完成这些工作。此外，我也认为如果一个人长大后想顺利地适应社会，那么在他的青年时期就必须认知到自己不是宇宙中心，同时记住自己的期望通常也不是所处环境里最为重要的因素。我还认为现今许多采取“渐进式教育”的学校在缺少专门技术的情况下去鼓励原创的做法是大错特错的。不过“渐进式教育”理论中有一些我十分喜欢的内容，特别是言论自由，自由探索生命，没有那种以发誓方式表达出远比严酷更令人震惊的愚蠢的道德规范。但是反抗不合理纪律的人常常过于极端，因而忘了某些纪律是必要的。这点在知识的获取上更是如此。

年龄与经验对我的见解并未产生本该有的影响，不过我已经体会到“自由”这个信念有一些重要的限制，在教育上这些限制则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明确观念。在既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大都取决于他们的习惯，没有好的纪律就得不到好的习惯。大多数的人一辈子没有偷窃过，但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法规戒律已经明文规定这项禁令，在如今看来已变得十分自然。如果儿童没有被教导过任何行为规范，就会彼此抢夺食物，而年纪较大的孩子就会夺去全部的好东西。

就国际事务而言，要让世界回到还过得去的状况不能靠拖延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只能藉由国际法，然而如果没有国际力量的支持它也无法奏效。就经济层面来说，现在任何讲求实际的人都不再奉行旧有的自由放任主义，只剩一些梦想家仍执迷不悟。

世界越拥挤，规范就变得越必要，这是令人遗憾的现实。《奥德赛》^[7]的世界是迷人的：主人翁奥德修斯一个人独自在各岛屿之间航行着，无论到哪儿总有一位可人的美女在等着他。然而如今移民限额的规定阻碍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奥德修斯只有自己一人所以不会有任何问题，但若有1亿的中国人移民到卡吕普索^[8]所居住的岛上时，生活就会变得困难许多。道理很简单：如果只是涉及自己的事，人们就应该可以自行决定；但是当他们被引诱去侵犯其他人的时候，就不应该享有自由了。虽然这个大道理朴素单纯，然而执行细节却是非常的复杂，因此关于人类自由的合理限制仍是一个难题。

虽然我一向为了这个世界和发生在我生命里的重大事件而忙碌，但是我仍视自己基本上是一位抽象哲学家。我一直设法把数学与科学上精确论证式的方法延伸至

传统上只崇尚模糊思考的领域。我喜欢精确。我希望轮廓分明，厌恶模糊不清。因为某个我不理解的原因，使得大多数人认为我是一个冷酷而缺乏热情的人。

情况似乎是只要能让人感受到热情的人就一定乐于自我欺骗，并选择居住在地上的愚人天堂里——地面上也没有其他种类的天堂。我无法认同这样的观点。当我对某件事愈有兴趣时，就愈想知道事实的真相，即使真相是让人感到不悦的。当我第一次对哲学感兴趣时，就希望我能在其中找到让我之前在宗教上受到挫败时渴求得以满足的东西。

曾有一段时间，我因为柏拉图所建构的理念的永恒世界而获得些许安慰。但是最后却发现一切都毫无意义，我无法在哲学里找到让自己接受宗教信仰的理由。在这点上，我认为哲学是失败的，但是在分析阐明事物的本质上，我发现哲学非常有用。我年轻时许多过去仍属揣测或令人感兴趣的事物都已变得精确和符合科学逻辑了。我对此感到欣慰，而且只要我能持续对这个结果有所贡献，我就会觉得在哲学上所做的研究都是值得的。

目前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愈来愈难让人专注于抽象事物。日常生活让哲学家喘不过气来，他们的“象牙塔”也开始崩溃。人类未来的问题越来越占去我过多的注意力。我生长在充满维多利亚^[1]乐观主义的年代，虽然当时那种从容的欢乐已不复存在，但是我仍然很容易对事物抱持希望。不过，现在不再那么容易了。这需要一定的执着精神与力量，以超越当前的眼光，朝着更遥远的未来看去。但我依然确信，不论面前的日子有多黑暗，人类将再露峥嵘；现在似乎已经失去的彼此宽容的习惯将重新恢复；用残酷暴行所进行的统治将不会持续太久。

人类必须领受一些新的教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科技上的创新并未伴随着智慧的成长。道德上的与智力知识上的要求相互纠结。邪恶的激情使人无法看到真理，虚妄的信仰为邪恶的激情提供借口。如果要使世界从困苦中走出，就必须有清晰的思维与仁慈的感情。或许只有在经历莫大的灾难时，人们才能学会这两种东西。我希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希望以较不痛苦的方式来学到智慧。不论道路有多崎岖，我坚信新世界所需要的新智慧迟早会被学到，人类历史最灿烂的部分展现在未来，而非过去。

注释

- [1] 1832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Bill）主要内容为扩大选举权（包括全体中产阶级）以及重划选区。
- [2] 墨西哥战争是指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1846.4 ~ 1847.9），起因于墨西哥对美国1845年吞并德克萨斯的愤怒，以及关于德克萨斯究竟是以墨西哥要求的努埃塞斯河为界，还是以美国要求的格兰德河为界。战争以墨西哥割让几乎囊括今日的新墨西哥、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全部领土给美国而告终。
- [3] 1848年革命几乎在全部欧洲国家蔓延，只有英国是例外。英国不受到影响是因为社会结构的缘故，而这是通过清醒的政府政策为其影响所及的国民生活条件付诸努力所致的。
- [4] 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 ~ 1881），英国政治家与小说家，两次担任英国首相。
- [5] 格拉史东（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 ~ 1898），英国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四度出任首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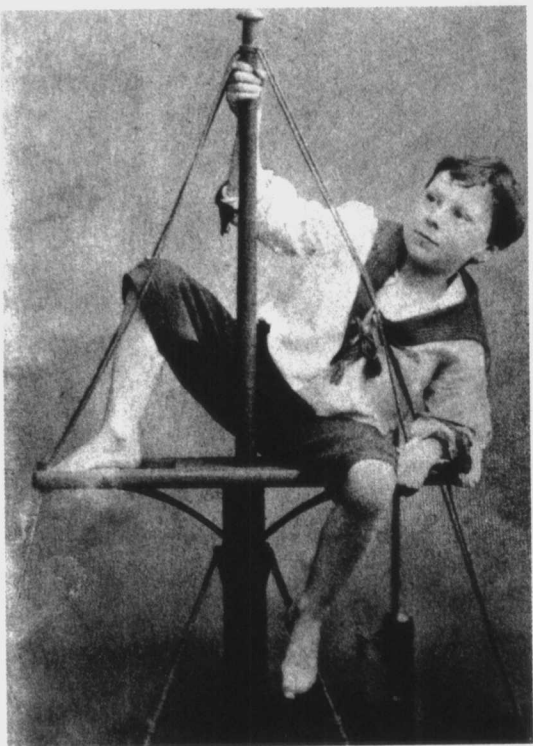
◆19世纪英国绘画:《生日快乐》,描绘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家庭庆祝生日的情景。
威廉·弗里思绘

- 【6】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1599 ~ 1658), 英格兰军人与政治家, 他号召英格兰人民推翻国王的残暴统治。在获得多次的军事胜利之后, 1649年, 亲自审讯并处死国王查理一世。
- 【7】《奥德赛》是希腊诗人荷马所写的史诗。主人翁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历经10年的流浪才返回家园, 诗中即描写了流浪期间的一切经过。
- 【8】卡吕普索是史诗《奥德赛》中的海上仙女, 她在自己的岛上款待希腊英雄奥德修斯, 让他待在岛上长达7年之久, 但是仍未打消他思乡的念头, 最后奉宙斯的命令放他回家。
- 【9】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 1819 ~ 1901) 于1837 ~ 1901年间在位, 即位时年仅18岁。在英国历史上, 维多利亚统治的时间最长。在她统治期间, 英国工业开始起飞, 科学、文学与艺术也有空前的成就。而从她开始及以后, 英国加紧向外扩张, 建立起了庞大的海外殖民地。这一时期被英国史学家称为“维多利亚时代”, 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六篇自述

1. 我为何喜欢哲学

有人之所以成为哲学家，背后有着不同的动机。过去最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渴望了解世界。在早期，当哲学与科学难以区别时，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而另一个动机——在早期也是重要的原因——则是基于理智上的幻觉。人们常问到：彩虹在哪儿？所有事物真如它们在阳光下或月光下所显现的样子吗？同样的问题以现代的观点诠释则为：所有事物真如我们肉眼所见或是显微镜下的表象吗？然而这样的疑惑很快便被另一个更广泛的疑惑所替补。当希腊人开始质疑奥林匹亚山上的神祇之际，某些人便在哲学里寻找可以替代传统信仰的东西。



◆ 罗素10岁时

以上两种动机的结合，引发了哲学上两个层面的变动：一方面哲学被认为要证明日常生活中所流传的大部分知识都不是真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要证明一个更为深奥的哲学真理是存在的，而且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相对于我们日常的想法，它更符合我们对全人类未来该有的期盼。几乎所有哲学都把“怀疑”视为刺棒（goad），“确定”则被视为目标（goal）。哲学家质疑理智、质疑科学，也质疑神学。哲学家各自质疑并关注其中的某一项目。哲学家对于以上质疑所提出的答案甚至是

否存在答案都有很大的分歧。

我选择哲学的理由涵盖了所有传统动机，但是有两项对我的影响最大。其中之一是最早影响我并持续最久的，就是期盼找到能够被公认为是真理的知识；另一个动机则是希望找到合理解释为何信仰宗教的理由。

我认为促使我走向哲学之路的第一件事发生在11岁的时候（虽然当时我还不认识“哲学”这个词）。儿童时期的我相当孤独，因为我唯一的哥哥大我7岁。正是由于太孤独，我因而变得相当严肃，还有许多可让我思考的时间，但却没有足够的知识供我运用于思维上。在验证数学的过程中我获得乐趣，但是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点，而这种乐趣正是拥有数学天分的人特有的表征。

长大之后，才发现也有许多人有着类似的经验。其中一位朋友哈地（G. H. Hardy）是一位纯数学教授，他就经常追寻这样的乐趣。他曾告诉我，如果能找到证据证明我会在5分钟内死去，他会为此感到难过，但是悲伤的心情很快就会被验证的乐趣所掩盖。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丝毫不觉得受到冒犯。

在我学习几何学之前，曾有人告诉我几何学就是要验证事物，因此当我哥哥说他愿意教我时，我的内心雀跃不已。几何学在当时仍然是欧几里德几何。我哥哥先从基本定义开始教起，这些我吸收得非常快。但是接下来便谈到公理，他说道：“这些是无法被验证的，但是在用来证明其他事物之前，它们必须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这几句话，我的希望开始瓦解。

过去我认为寻找可以被证明的东西是非常美妙的事，然而结果却只能藉由某些无法获得证明的假设才可达到目的。我以某种愤怒的眼光看着哥哥说道：“既然无法证明这些公理，我们又如何要接受其真实性？”他回答说：“如果你不承认，就无法继续我们的课程。”我心想知道后面的故事也没什么不好，就暂时同意去承认这些公理。然而对这个我希望从中找到明确无误的真理的领域，我仍然充满狐疑与困惑。

撇开这些疑问不谈——大部分时间我早将它们抛到九霄云外，而且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找到当时自己仍不晓得的答案——在数学中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事实上比起其他学科要多得多。我热衷于思考如何将数学应用到物质世界中去，也希望将来有一天关于人类行为的数学可以如应用于机械上的数学一样精准。我之所以有此希望，是因为我热衷于验证，而多数时候这项动机比我同时想要确认有自由意志存在的渴望更为重要。不过，我从未完全克服对数学正确性最根本的怀疑。

当我开始学习高等数学时，却因为新的困难而深受打击。我感受到老师所教授的验证方法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在我日后的学习中得到确认。当时我并不知道，在我离开剑桥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德国数学家早已经发现了较好的证明方法。我因此接受了康德哲学里夸大的辩证方法。而这也让我重新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检视，在过程中那些过去困扰我的难题都变得琐碎不重要。日后我才发觉一切都错了，但这是在我深深浸淫于形而上学的泥沼之后的事。

对数学的某种厌恶激发我转向哲学，而此种厌恶源自于数学太过专注于考试时所需要的技巧。这种学会考试技巧的企图使我觉得数学是由机灵的闪躲和精巧的设计所构成的，简直就像是填字游戏。待在剑桥大学的头3年结束之际，当我从最后一次数学考试中走出来时，我发誓绝不再碰数学，还将所有的数学课本卖掉。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我从哲学的探索中得到的一切欢愉有如看到一个正从峡谷中浮现出来的崭新景观一样。

过去我并不只是在数学领域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如同笛卡尔^[1]（当时我还未看过他的著作），我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和他一样，我觉得把外在世界想象为只不过是一场梦是可接受的。但即使是如此，真正被梦到的才叫梦，而我亲身体验的真实事情才拥有不可动摇的确定性。这样的思路是在我16岁时第一次出现，而当我后来知道笛卡尔早已以此作为其哲学基础时兴奋不已。

在剑桥时，我对哲学的兴趣还源自于另一个动机的激发。曾经促使我对数学产生质疑的怀疑主义，也让我对宗教的基本教义产生疑问，但是我仍热切地希望能找到一个方法，以保存一种最起码还可以称之为宗教信仰的东西。自15 ~ 18岁的3年间，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我花了大量时间和心思。我逐一检视基本的教义，衷心期盼找出接受这些教义的理由。我将想法写在笔记本里，至今我仍保存着。当然这些想法很粗糙且不成熟，因为当时我无法找到解释教义中提出的“不可知论”的答案。在剑桥，我意识到先前所忽略的思想的整个体系，我也一度放弃了一些在我孤独时所想出的见解。

在剑桥，我也开始研读黑格尔^[2]的哲学，在那深奥难懂的19卷著作里面，他宣称已经证明了某种东西相当适合作为传统信仰的精致变体。黑格尔把宇宙视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他的宇宙就好比是果冻，如果你轻触任何一个部位，整个果冻就会颤抖；但是它又不像果冻，因为无法把它切开。对他来说，由许多部分所组成的外表看来是而且其实只是种错觉。“绝对”才是唯一的实在，也就是他所谓的上帝。

有一阵子我从这种哲学观点中找到了慰藉。当它的拥护者，尤其是当时我的一位密友麦克塔加（McTaggart）把这种观点介绍给我时，黑格尔的哲学看来不但令人着迷，同时也具备可论证性。麦克塔加的哲学经历早我6年，而他终身是黑格尔的信徒。他对同时代人的影响极为深远，有一段时间我也受到他的影响。当一个人使自己相信时间与空间是不真实的，物质只是一个幻觉，世界除精神外没有其他时，便会产生一种奇怪的乐趣。然而在短时间内我从信徒变成师傅，并发现黑格尔他自



◆ 黑格尔